

《转法轮经》诸本源流考^{*}

萨尔吉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本出发，对佛陀初转法轮这一事件的相关叙事和经典进行了梳理，重点考察了藏译本中题名为《(转)法轮经》的两部译本。通过文本比对，发现藏译本《法轮经》实际上并非是独立的经典，而是从《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摘录出来，单独成篇。藏译本《转法轮经》反映了历史上南传佛教的影响。通过对《转法轮经》诸本源流的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转法轮经》相关典籍的集成、翻译与传播史的理解。

引言

佛陀成道后在鹿野苑对五比丘宣说法义的记载不仅是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佛教初期教义的重要体现。佛教徒对此事的记忆不仅反映在以《转法轮经》为核心的经典集成中，也包含在佛传故事、律藏文献以及相关的经典注释中。经典的主体内容是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蕃时期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ZD210)的阶段性成果。

世尊觉悟后，打算首先教导最初跟随他的五比丘，于是前往波罗奈斯鹿野苑，首先宣讲了离开苦乐两个极端的中道，即八正道。然后以三转十二行相的方式宣讲了苦、集、灭、道四谛，接下来讲了如何获证无上正等正觉，憍陈如得证，佛陀称呼憍陈如为遍知憍陈如，最后诸夜叉天神赞叹世尊所说。

随着佛教在亚洲地区的广泛传布，与《转法轮经》相关的叙事的接受与翻译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本文拟以现存的梵语、巴利语文献为出发点，探讨《转法轮经》相关典籍的集成、传播与翻译的历史。通过文本互读的方式，探讨文本之间的差异，以及造成此种差异的可能原因，以此窥见佛教文献在各民族间的接受、翻译与互动。

一、《转法轮经》原典及其相关经典

《转法轮经》(*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一般被认为是佛陀成道后最先宣讲的佛经，在佛教史上地位重要。巴利三藏《相应尼柯耶·大篇》中的“谛相应”有名为“转法轮品”的十部经典，其中第一经可以视作《转法轮经》的主题内容，经文以常见的“如是我闻”开始，讲经的对象是五比丘。佛陀首先讲了离二边中道，然后讲到了四圣谛的具体内容，以及指示要从知苦、断集、证灭、修道的未然、应然、实然三方面来理解四圣谛，称之为三转十二行相法轮，这也是《转法轮经》的核心内容。接下来是诸天赞叹世尊所说，世尊赞叹憍陈如得证¹。

除了《相应尼柯耶》外，与《转法轮经》相关的叙事保存在巴利律藏文献犍度篇中的《大品》中。《大品》始于佛陀在菩提树下证道之际，其中的“诵品一”止于佛陀教化五比丘，与《转法轮经》相关的内容始于佛陀证道后，经梵天劝请讲经，观察何人可以授道，睹见五比丘在鹿野苑，于是前往传法。然后是前述《转法轮经》的主体部分。《大品》接着讲述憍陈如受戒，以及其他几位追随者得证、出家、受戒。最后讲到了世尊宣说五蕴的无我、无常，以及对五蕴的厌离、解脱。《大品》以“世间有六阿罗汉”作为第一诵品的结束。与《相应尼柯耶·大篇》相比较，虽然律藏相关部分叙事的内在

1 第一经在该品中冠名为“如来所说”，接下来的诸经顺接第一经，没有序分，其中与第一经直接相关的是同样冠名为“如来所说”的第二经，内容是对第一经中的三转十二行相法轮的重复。对于巴利语《相应尼柯耶》经文多寡、编排原则等的复杂性的说明，可以参见 Oskar von Hinüber, *A Handbook of Pāli Literature*,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6. 其中谈到若要用巴利圣典协会的校勘本与梵文平行文本相较时，一定要小心巴利圣典协会的校勘本有可能是“某种假想的本子”(a kind of phantom text, 第 36 页, 第 70 条)，这说明现有的校勘本不足以说明巴利语《相应尼柯耶》的真实面貌。

逻辑是着重于世尊觉悟后僧团的建立，以此为主线将《转法轮经》的内容内嵌到了佛传之中，围绕这一活动的前因后果也有许多铺陈，但在主体部分，二者所用的语句几乎是逐字对应，说明二者要么是源于一个共通的源头，要么是一方照搬了另一方²。

在南传佛教的传统中，《转法轮经》还是四方传教时前往北方雪山地区传教的僧人宣说的经典。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梵文文献。目前发现的梵文本中似乎没有《转法轮经》的单行本流通，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四众经》(*Catuṣpariṣatsūtra*)讲述的是佛陀成道后收摄徒众的事迹，初转法轮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关内容被内嵌到了该经之中³。郑镇一对中亚发现的一些可以归属为《转法轮经》的残本进行了罗列，他将《转法轮经》相关残片分为了四组，一组可以归入说一切有部的《杂阿含经》，一组可能是单行本，一组归属不明，一组属于《四众经》，但他并未给出分类的依据⁴。

除了上述中亚写本，一些现存的梵文文献也引述了《转法轮经》的相关内容，兹列举如下：

1. 《神通游戏经》(*Lalitavistara*)⁵，这是与说一切有部相关的佛传叙事，亦有藏汉译本；
2. 《大事》(*Mahāvastu*)⁶，这是大众部说出世部的佛传叙事，无藏汉译本；

2 如果按照一般的认识，应该是经藏早于律藏，所以说是后者抄录了前者。参见 Oskar von Hinüber, *A Handbook of Pāli Literature*, 1996: 18, 第 34 条。

3 Ernst Waldschmidt, *Das Catuṣpariṣatsūtra, eine kanonische Lehrschrift über die Begründung der buddhistischen Gemeinde,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r Sprachen, Literatur und Kunst, Jahrgang 1960, Nr. 1,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62.*

4 Jin Il Chung, "Dharmacakrapravartana dharmaparyāya of the Sarvāstivāda and Mūlasarvāstivāda Tradition." In *Jaina Itihāsa Ratna. Festschrift für Gustav Roth zum 90. Geburtstag*, eds. Ute Hüsken, Petra Kieffer Pülz & Anne Peters, Indica et Tibetica series no. 47, Marburg, 2006: 75-102. 关于《四众经》以及《转法轮经》梵文本存世情况的最新整理，参见 Klaus Wille, "Survey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Turfan Collection (Berlin)." In *From Birch Bark to Digital Data: Recent Advances in Buddhist Manuscript Research.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Indic Buddhist Manuscripts: The State of the Field Stanford, June 15-19 2009*, eds. Harrison, Paul and Jens-Uwe Hartmann, Beiträge zur Kultur- und Geistesgeschichte Asiens 80; Denkschriften der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460. Vienn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223-246.

5 Salomon Lefmann, *Lalita Vistara: Leben und Lehre des Çākya Buddha*, Hall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 1902-1908 (东京 1977 年重印)，第 416 页第 13 行至第 418 页第 21 行。

6 Katarzyna Marciniak ed., *The Mahāvastu. A New Edition*, Volume III.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 BPPB), XIV, 1,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2019: 422-427. 《大事》中冠以“转法轮经”的这一部分相当长，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部分对应的是前面几页，其有完整的序分（如是我闻），以及大致对应的流通分（五比丘对佛所说欢喜踊跃），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个单独的整体。

3. 《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Samghabhedavastu*)⁷，有藏汉译本；

4. 《俱舍论·显明义疏》(*Abhidharmakośavyākhyā Sphuṭārthā*)，称友(Yaśomitra)注疏，仅有藏译本。

除了上文提到的文献，汉译佛典中与《转法轮经》相关的译本可以胪列如下：

单经：后汉安世高译《转法轮经》⁸、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第379经（大致相当于巴利语《相应尼柯耶·大篇》中的对应部分）、唐义净译《三转法轮经》等。

属于佛传的：包括《中本起经·转法轮品》、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转妙法轮品》。律藏文献如法藏部《四分律》、化地部《五分律》等。

此外，《鞞婆沙论》《阿毗达磨法蕴足论·圣谛品》也有相关内容。还有诸如《大庄严论经》《成实论》等也提到了《转法轮经》，因为并非是大段引用，兹不具述。

藏译佛典中保存了《转法轮经》的两部独立译本（下详），此外，《出家经》(མཛོད་པར་འབྱུང་བའི་མཛོད་)⁹，以及寂住天(Śamathadeva)的《俱舍论释》(*Abhidharmakośaṭīkopāyikā*)¹⁰也引用了该经。

以上对《转法轮经》原本译本的考察绝非穷尽，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转法轮经》相关文本的丰富。如果对上述涉及转法轮的内容相比较，可以发现关于转法轮部分的形态还是比较稳定，最大的差异在于在宣讲四谛形相时，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文献反复提到了四个一组的词汇，即眼(cakṣu)、智(jñāna)、明(vidyā)、觉(buddhi)（包括《四众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俱舍论·显明义疏》、汉译《十诵律》《阿毗达磨法蕴足论·圣谛品》等）。巴利语在相关之处是五个一组的词汇，即眼(cakkhu)、智(ñāṇa)、慧(paññā)、明(vijjā)、显(āloka)。这一组词汇在《神通游戏经》中变为了七个：智(jñāna)、眼(cakṣu)、明(vidyā)、多闻(bhūri)、智慧(medhā)、慧(prajñā)、显(āloka)；在《大事》中变为八个：智(jñāna)、眼(cakṣu)、明(vidyā)、觉(buddhi)、多闻(bhūri)、智慧(medhā)、慧(prajñā)、显(āloka)。鉴于这一组词汇与四谛十二行相渊源颇深，它们之间的差异和流变还值得深入思考。因此，利用各种文本，梳理出《转法轮经》在佛教不同部派中的叙事脉络和强调重点，当是今后研究的

7 R. Gnoli ed., *The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ṅghabhedavastu, being the 17th and Last Section of the Vinay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 Part I, Rome: IsIAO, 1977-1978: 133-139.

8 根据赵悠的研究，这是一部建立在安世高失译原本上的改译本，而改译的主要作者可能是支谦。赵悠：《止逆而转——安世高译〈转法轮经〉再探》，发表于“燕园佛学”网站：<https://mp.weixin.qq.com/s/ikkPS5Szk1yJ7RTl2vbYEA>。

9 德格版大藏经 D 301，函，58b5-62a4。

10 德格版大藏经 D 4094，函，28a7-29b6。

任务。

二、藏译中的《转法轮经》

如上述所述，藏译保存了《转法轮经》的两部独立译本，一本题名为《法轮经》(ཆོས་ཀྱི་འཁོར་ལོའི་མདྲོ་)，不具译者；另一本题名为《转法轮经》(ཆོས་ཀྱི་འཁོར་ལོ་རབ་བྱ་བསྐྱར་བའི་མདྲོ་)，译为斯里兰卡僧人阿难陀师利(Ānandaśrī)和藏族僧人塔巴译师尼玛坚赞(ཐར་པ་ལོ་ལྷ་བ་ཉི་མ་རྒྱལ་མཆན་)，一般称之为新译，以下分述之。

1. 《法轮经》

《法轮经》在笔者目前掌握的《甘珠尔》的目录中编号如下：

德格版	北京版	纳塘版	卓尼版	拉萨版	协噶版	朵宫版	普扎版	藤邦玛版
337	1003	322	976	341	151	208	187	257

《法轮经》讲经的地点在波罗奈斯鹿野苑，讲经的对象是以阿若憍陈如为首的五位比丘，内容大致可划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佛陀以三转十二行相的方式宣讲了苦、集、灭、道四谛；第二部分佛陀宣讲如何获证无上正等正觉，第三部分讲述憍陈如得证；第四部分佛陀称呼憍陈如为遍知憍陈如；第五部分为诸夜叉天神赞叹世尊所说，将此法门冠名为“转法轮”。虽然现有的经题为《法轮经》，但是从结尾来看，应该称之为《转法轮经》，此处为了与后文论述的《转法轮经》区别起见，仍将其称之为《法轮经》。

《法轮经》有独立的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是一部完整的经典。协噶版、朵官版、普扎版和江孜藤邦玛版在结束之际有一条简短的跋文，说该经看来与塔巴译师所译的是同一部经¹¹。其他《甘珠尔》版则未提供任何信息。

《法轮经》不见载于现存吐蕃时期的两部经录，即《旁塘目录》（དཀར་ཆག་འཕང་མང་མ）

11 ཐུང་པ་ལོ་ཚུ་བས་བཟུང་བ་དང་། མདོའི་རོག་ཅིག་ཏུ་སྒྲང་།

和《丹噶目录》(དཀར་ཆག་ལྷན་དཀར་མ།)¹²。菊登日比热赤(བཙམ་ལྷན་རིག་པའི་རལ་གྱི། 1227-1305 年)的《大藏经目录论典广说》(བཀའ་བསྟན་དཀར་ཆག་བསྟན་པ་བྱས་པ།)中也没有记载该经¹³。目前我们所见的该经的最早记载是布顿(བུ་སྟོན་རིན་ཆེན་གྲུབ། 1290-1364 年)于 1322 年写成的《佛教史大宝藏论》¹⁴,说明至少在 14 世纪初,该经已经进入《甘珠尔》系统。

藏译《法轮经》虽然未见载于早期经录,但其用语则体现出吐蕃时期译经的特征。如前所述,初转法轮作为佛陀生平的一个重要事迹,在讲述佛陀传记的文献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叙述,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藏文献《破僧事》也不例外。《破僧事》在讲到佛陀初转法轮时,内容比《法轮经》要详细得多。其中讲到世尊觉悟后,打算首先教导最初跟随他的五比丘,于是前往波罗奈斯鹿野苑,因世尊放弃苦行,令五比丘生疑,所以他首先讲了离开苦乐两个极端的中道,即八正道。然后佛陀以三转十二行相的方式宣讲了苦、集、灭、道四谛等等,从这部分一直到诸夜叉天神赞叹世尊所说,对应《法轮经》的主体部分。接下来佛陀对五比丘讲了四谛的具体内容,最后以佛陀宣讲人无我内容结束。

经过比对,我们可以发现藏译《法轮经》的遣词造句与《破僧事》的对应部分如出一辙,我们有理由怀疑藏译《法轮经》的翻译是直接摘录自《破僧事》,或者说,《法轮经》的译者完全借用了《破僧事》对应部分的翻译,而没有另起炉灶。

无独有偶,上述《破僧事》的所有内容亦见于藏译《出家经》(མངོན་པར་འབྱུང་བའི་མཛོད།)中。关于二者的对应关系,我们以德格版《甘珠尔》为例来说明,首先看以下的表格:

12 《旁塘目录》参见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国外学者对《旁塘目录》的整理研究参见 Eishin Kawagoe (川越英真), *Dkar chag 'Phang thang ma* (Tohoku Society for Indo-Tibet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3), Sendai: Tohoku Society for Indo-Tibetan Studies, 2005; Georgios T. Halkias, "Tibetan Buddhism Registered: A Catalogue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of 'Phang thang." *The Eastern Buddhist*, New Series vol. 36, nos. 1-2, 2004: 46-105。

《丹噶目录》最早由拉露编号, Marcelle Lalou, "Contribution à la bibliographie du Kanjur et du Tanjur: Les textes bouddhiques au temps du roi Khri sroñ lde bcen." *Journal Asiatique*, 1953: 313-354。最近的研究参见 Adelheid Herrmann-Pfandt, *Die lHan kar ma: ein frü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ü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 kritische Neuausgabe mit Einleitung und Materialien* (Denkschriften /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367. Bd.), Vienna: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8。

13 Kurtis R. Schaeffer and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eds., *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com ldan ral gri*,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 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 བུ་སྟོན་རིན་ཆེན་གྲུབ། བུ་སྟོན་ཆོས་འབྱུང་གསུང་རབ་རིན་པོ་ཆའི་མཛོད། བེ་ཅིན། གྲུང་གོའི་བོད་ཀྱི་ཤེས་རིག་དཔེ་སྟར། 1991: 214。根据西岡祖秀的编号,为 50 号,详参见 西岡祖秀编:《「ブトウン仏教史」目録部索引 I》,《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施設研究紀要》4, 1981: 67。

《出家经》(D 301)	《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D 1)
4a1-24b1	ྒ 函, 275b4-293a6
24b2-87b1	ྒ 函, 1a1-75a4
87b1-90b4 ¹⁵	
90b4-106b1	ྒ 函, 91a5-107a1
106b1-125a6	ྒ 函, 256a4-275b4

从表格可以看出,《出家经》除了序分的前 4 叶,以及约中间部分的 3 叶外,其他都能在《破僧事》中找到对应之处,但顺序与《破僧事》不太一致。具体而言,《出家经》的最后 20 叶(106b1-125a6)在《破僧事》中排序靠前,然后依序,到《出家经》中间部分的 3 叶,在《破僧事》无对应文句,同样,《破僧事》连续叶码中约有 16 叶(75a4-91a5)在《出家经》无对应之处。

经查验,《出家经》中间部分的 3 叶内容对应《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出家事》,讲述的是舍利弗、目犍连皈依之事。前 4 叶未找到对应文句,猜测应是《出家经》的独特内容。

《出家经》的内容主要与佛陀生平相关,《破僧事》也是如此,因此二者内容可以勘同并不令人奇怪。有意思的是,二者不仅在内容上近乎一致,在遣词造句上,《出家经》亦与《破僧事》高度契合,即使我们考虑到二者所据梵文底本的一致,以及梵藏翻译策略的趋同,二者的契合性也无法得到完全说明。

《出家经》的跋文保留了具体的翻译信息,从中我们得知该经是印度阿闍梨法吉祥贤(Dharmaśrībhaddra)和藏族大译师仁钦桑波(རིན་ཆེན་བཟང་པོ། 957-1055 年)一起翻译的,因此,该经的翻译年代要晚于《破僧事》。考虑到二者的年代关系,上文所提二者的高度契合性的最合理的解释是《出家经》的翻译参考了《破僧事》,甚至可以说是直接摘录了《破僧事》。

《出家经》虽冠名为经,并且收录在《甘珠尔》中,但是它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序分和流通分。经文的一开始是对三宝的赞颂,以及造论者的祈愿,因此,历史上也有人怀疑这是某个声闻弟子的笔记。例如,约 16 世纪成书的白嘎桑布(པལ་དཀར་བཟང་པོ།)的《经

15 对应之处见《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出家事》,D1,ྒ 函,32b6-36a7。

藏总论》即持这样的看法¹⁶。

论证《出家经》对《破僧事》的参考和抄录，还有一个反例。藏译中保存有另一部叙述佛陀生平的经典，称之为《方广游戏经》(འཕགས་པ་རྒྱ་ཆེར་རྩལ་པ་ཞེས་བྱ་བ་ཟེག་པ་ཆེན་པོའི་མཛད་)，即我们前面提到的《神通游戏经》，其与《破僧事》相关内容的对应参见下表：

《方广游戏经》	《破僧事》
五比丘生疑	五比丘生疑
诸天敷座，请佛转法轮	
离苦乐中道，八正道	离苦乐中道，八正道
四谛具体内容	
三转十二行相	三转十二行相
如何获证无上正等正觉	如何获证无上正等正觉
	憍陈如得证
	赞叹憍陈如
	诸天赞叹
	四谛具体内容
人无我	人无我
十二因缘	
憍陈如得证	

从表格可以看出，二者在内容的多寡和顺序上都有一定的差异。《方广游戏经》在叙述佛陀觉悟后，直入主题，向五比丘宣讲离苦乐中道和八正道，然后讲四谛的具体所指，这部分在《破僧事》中则出现在结尾部分。《方广游戏经》也缺乏赞叹憍陈如和诸天赞叹的内容。

除了上述差异，《方广游戏经》的遣词造句也与《破僧事》不一致，说明二者所据的底本并不一样，而且部分地方《方广游戏经》比《破僧事》要增广，比如，《方广游戏经》有大段的诸天敷座，请佛转法轮的描述，又如，世尊在讲到如理思维后的状态时，《破僧事》用了生眼、智、明、觉四个词，而《方广游戏经》则用了生智、眼、明、

16 བད་དཀར་བཟང་པོ། མཛད་ལྷོ་སྤྱི་ལོ་ལྷན་པ་ཞུགས། བེ་ཅིན། 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2006: 475.

多闻、智慧、慧、显七个词，除了共同的眼、智、明三词，《方广游戏经》的多闻、智慧、慧、显似乎都是对“觉”的解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方广游戏经》，或者更准确地说，《方广游戏经》现存梵文本的年代可能要比《破僧事》晚一些¹⁷。

综上，《甘珠尔》保存的《法轮经》的翻译年代和翻译情况虽然不详，但是很有可能是借鉴甚至抄录了《破僧事》，因此，反映了（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传统。《出家经》的部派归属虽然不清楚，但就转法轮这部分而言，与《破僧事》高度契合，因此反映的也应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传统¹⁸。

2.《转法轮经》

《转法轮经》在笔者目前掌握的《甘珠尔》的目录中编号如下：

德格版	北京版	纳塘版	卓尼版	拉萨版	协噶版	朵宫版	普扎版	藤邦玛版
31	747	347	1014	32	204	289	阙	335

《转法轮经》的内容大致可分为：第一部分佛陀向五比丘宣讲了离苦乐中道，八正道；第二部分佛陀宣讲了四谛的具体内容；第三部分佛陀以三转十二行相的方式宣讲了苦、集、灭、道四谛；第四部分佛陀宣讲如何获证无上正等正觉，第五部分讲述憍陈如得证；第六部分为诸天赞叹世尊所说；第七部分佛陀称呼憍陈如为遍知憍陈如。

相较于《法轮经》，《转法轮经》的内容更为丰富，在行文顺序上，似乎更接近《方广游戏经》，诸本内容比较如下：

《法轮经》	《转法轮经》	《方广游戏经》	《破僧事》
		五比丘生疑	五比丘生疑
		诸天敷座，请佛转法轮	
	离苦乐中道，八正道	离苦乐中道，八正道	离苦乐中道，八正道
	四谛具体内容	四谛具体内容	
三转十二行相	三转十二行相	三转十二行相	三转十二行相

17 一般而言，梵文写本的特征有倾向于增广的趋势，而且对较古的词汇会采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汇进行诠释，造成同类词汇的“堆砌”现象。当然，对文本之间的差异的解释要比这复杂得多，也会有相反的情况。

18 一般认为，《方广游戏经》反映了说一切有部的传统，但至少就此部分而言，似乎有出入。

要求翻译，史载札巴坚赞曾从元成宗完泽笃（1294-1307 年在位）处获得国师封号，据此，《转法轮经》的翻译不会早于 1307 年。而前述布顿 1322 年写成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中已经记载了该经²⁰，说明《转法轮经》的翻译当在 1307-1322 年之间。

对于译跋中提到的翻译者，我们对其生平知之甚少，我们仅仅知道阿难陀师利是斯里兰卡僧人，他的合作者是尼玛坚赞，后者曾经当过布顿的老师。今《甘珠尔》中保留了二者合作翻译的佛经十三部²¹，其中最后一部《大吉祥经》的译跋提供了比《转法轮经》译跋更多的信息，翻译如下：

凭借此之福德业，未获觉悟期间吾，大药（童子）之智慧，光明富足之受用，普施（太子）之布施，生生世世我得成！

《转法轮经》《本生因缘解说》《柳叶宫殿经》《大会经》《慈经》《修慈经》《宣说五戒利益经》《具寿山难陀经》《调伏难陀优波难陀龙王经》《上座大迦叶经》《日经》《月经》《大吉祥经》，此等十三部经是根据距离南瞻部洲之中央、圣地、菩提道场金刚座东北百由旬之藏地、雪山之中、后藏年（楚河流）域春堆古尔莫地区圣自生观自在之大寺寺主、对佛陀世尊教法怀有浓厚敬仰，在政治经济诸方面获得正善自在地位的夏鲁巴古尚·札巴坚赞都元帅之敕令……（其后内容与《转法轮经》一致）²²

与《转法轮经》相比，《大吉祥经》增添了发愿文，十三部经典的标题，以及札巴坚赞的辖境与菩提伽耶的位置关系。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也记载了阿难陀师利和

20 བུ་སྟོན་རིན་ཆེན་གྱི་བུ་སྟོན་ཆོས་འབྱུང་གསུང་རབ་རིན་པོ་ཆེའི་མཛད། 1991: 225. 根据西岡祖秀的编号，为 378 号，见西岡祖秀编：《『フツン仏教史』目録部索引 I》，1981: 76。

21 关于这十三部佛经的研究，可以参看 Peter Skilling, "Theravādin Literature in Tibetan Translation."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Vol. XIX, 1993: 69-201. 文中不仅讨论了《甘珠尔》中保存的上座部文献，也讨论了《丹珠尔》中保存的上座部文献，以及涉及上座部教义的文獻。

22 འདི་ཡི་བསོད་ནམས་ལས་ཀྱི་ནི། ལངས་ཀྱི་མ་ཐོབ་བར་དུ་བདག་སྒྲིན་ཆེན་པོ་ཡི་ཤེས་རབ་དང་། །འོད་གཙོ་ལྷག་པོའི་འོངས་སྤྱོད་དང་། །ཐམས་ཅད་སྒོལ་གྱི་སྤྱན་པ་དང་། །སྒྲིབ་སྒྲིབ་རབ་བདག་ལ་ལྷུང་། །
འཕགས་པ་ཆོས་ཀྱི་འཁོར་ལོ་བསྐྱར་བའི་མདོ་སྒྲིབ་པ་རབས་ཀྱི་སྤང་གཞིའི་བཤད་པ། །ལྷུང་ལོ་ཅན་གྱི་ཕོ་བྲང་གི་མདོ། འདུས་པ་ཆེན་པོའི་མདོ། བྱམས་པའི་མདོ། བྱམས་པ་བསྐྱམས་པའི་མདོ། རྒྱལ་ཁྲིམས་ལཱའི་པན་ཡོན་བསྟན་པའི་མདོ། ཆོ་དང་ལྷན་པ་རིའི་ཀྱན་དགའ་བའི་མདོ། ཐུའི་རྒྱལ་པོ་དགའ་བོ་དང་ཉེར་དགའ་འདུལ་བའི་མདོ། གནས་བརྟན་འོད་སྲུང་ཆེན་པོའི་མདོ། ཉི་མའི་མདོ། ལྷ་བའི་མདོ། བཟླ་ཤེས་ཆེན་པོའི་མདོ་ཞེས་བྱ་བ་སྟེ། དེ་ལྟར་མདོ་བཅུ་གསུམ་པོ་འདི་རྣམས་ནི་འཛམ་གྱི་མིང་གི་དབྱེས། འཕགས་པའི་ལཱ། བྱང་ཆུབ་ཀྱི་སྤྱོད་པོ་རྫོ་ཆེའི་གདན་ལས་དཔག་ཚད་བརྒྱ་ཙམ་བྱང་ཤར་དུ་བསྟོད་པའི་བོད་ལཱ། གངས་རིའི་ཁྲོད། ཟང་ཉང་རོ་ཚོང་འདུས་འགྲུར་མའི་ས་ཆ། འཕགས་པ་རང་བྱུང་འཇིག་རྟེན་དབང་ལྷག་གི་གཙུག་ལག་ཁང་གི་བདག་པོ། ལངས་ཀྱི་བཙེམས་ལྷན་འདས་ཀྱི་བསྟན་པ་ལ་ལྷག་པར་མོས་ཤིང་། དཔལ་འབྱོར་དང་ཆབ་སྲིད་དུ་མ་ལ་དབང་ལྷག་དམ་པའི་གོ་འཕང་ཚོབ་པའི་ཞལ་བ་སྤྱོད་ལྷག་པར་ལྷག་པར་མཆོད་དུ་དབེན་ཤིང་བཀའ་ལྷུང་གིས།……

尼玛坚赞合作翻译的佛经，但是他只给出了十二部的题名，少了《月经》²³。

三、结论

1. 作为佛陀成道后初次宣说的经典,《转法轮经》在佛教叙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转法轮经》的内容如何成为佛传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它是如何以单篇经典的形式独立出来,值得进一步研究。

3. 藏译《转法轮经》的两部单篇经典中，一部显然是受到了南传佛教的影响，但另一部显然不是译自单篇的印度文本，它为何会从《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单独抽取出来，独立成单经，这种处理是否同样受到了南传佛教的影响，值得进一步考察。

1. འི་ཀླུ་དགའ་པོའི་མདོ། 2. ལྷའི་ལྷུ་ལ་པོ་དགའ་པོ་དང་ཉེར་དགའ་བཟུང་བའི་མདོ། 3. རོད་ལྷུང་མ་ཆེན་པོའི་མདོ། 4. ཉེ་མའི་མདོ། 5. བཟ་མེས་ཆེན་པོའི་མདོ། 6. འཕྲུལ་པ་ཆེན་པོའི་མདོ། 7. བྱམས་པའི་མདོ། 8. བྱམས་པ་བསྐྱེད་པའི་མདོ། 9. བསྐྱེད་པ་ལྷའི་ལམ་ལོན་གྱི་མདོ། 10. ཆོས་ཀྱི་འཁོར་ལོ་རབ་ཏུ་བསྐྱར་བའི་མདོ། 11. ལྷུ་ལ་པོ་དགའ་གྱི་མཛེད་གཤི། 12. ལྷུང་ལོ་ཅན་གྱི་པོ་བྱང་གི་མདོ།
དེ་རྒྱམས་པ་ཤི་ཏ་ལ་ཉམ་མི་དང་མེ་མ་ཉེ་མ་ལྷུ་ལ་མཆོན་དཔལ་བཟང་པོ་ལ་གསལ་ཏུ་བསྐྱར་བ་ཡིན། འདི་རྒྱམས་པར་གྱི་དང་ལྷུ་ལ་པོ་ལྷུ་ལ་པོ་ལ་ཆེ་ལྷུང་གང་ཡིན་དཔུང་པར་བྱའོ།

24 德格版《甘珠尔》中收录的阿难陀师利翻译的经典，只有上述十三部，但是北京版《甘珠尔》中则保存有阿难陀师利翻译的另一部经典，即《圣慈经》（འཕགས་པ་བྱམས་པའི་མཛོད།），该经除了在北京版（P 1010）有收录外，还见于拉萨版和纳塘新版。

附录一 《法轮经》藏译汉

印度语：达磨斫羯罗修多罗

藏语：法轮经

顶礼一切智！

如是我闻，一时，佛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说鹿野苑处。尔时，世尊告五比丘：

“诸比丘！我对往昔未闻之诸法如理思惟：‘此是苦圣谛’，生眼，生智、明、觉、悟²⁵。

诸比丘！我对往昔未闻之诸法如理思惟：‘此是苦集²⁶，此是苦灭，此是趋苦灭道’，生眼，生智、明、觉、悟。

诸比丘！我对往昔未闻之诸法如理思惟：‘我应以现知彻知彼苦圣谛’，生眼，生智、明、觉、悟。

诸比丘！我对往昔未闻之诸法如理思惟：‘我应以现知断除彼苦集圣谛’，生眼，生智、明、觉、悟。

诸比丘！我对往昔未闻之诸法如理思惟：‘我应以现知现证彼知苦灭圣谛’，生眼，生智、明、觉、悟。

诸比丘！我对往昔未闻之诸法如理思惟：‘我应以现知修习彼趋苦灭道圣谛’，生眼，生智、明、觉、悟。

诸比丘！我对往昔未闻之诸法如理思惟：‘我已以现知彻知彼苦圣谛’，生眼，生智、明、觉、悟。

诸比丘！我对往昔未闻之诸法如理思惟：‘我已以现知断除彼苦集圣谛’，

25 关于“觉”（མཛ）和“悟”（རྟོགས་པ་）的翻译，遵循藏译：མྱོང་ངེ་རྟོགས་པ་。需要注意的是，现存的对应梵文本《破僧事》在此处只有 buddhi 一词，但《破僧事》藏译本依然译为 མྱོང་ངེ་རྟོགས་པ་ 究其原因，可能是所据底本不同，也可能是译者对 buddhi 的双重翻译。需要注意的是，在《翻译名义大集》中，buddhi 对应的藏译是 མྱོང་（第 2879 条），而 buddha 也可以翻译为 རྟོགས་པ་（第 2900 条）。

26 德格版在此前加有“此是苦”，据北京版等改。

生眼，生智、明、觉、悟。

诸比丘！我对往昔未闻之诸法如理思惟：‘我已以现知现证彼知苦灭圣谛’，生眼，生智、明、觉、悟。

诸比丘！我对往昔未闻之诸法如理思惟：‘我已以现知修习彼趋苦灭道圣谛’，生眼，生智、明、觉、悟。

诸比丘！当我对此等四圣谛不生如此三转十二行相之眼，不生智、明、觉、悟，在此期间，我不会从此天世间、魔、梵天、沙门、婆罗门之诸众、天人中解脱、出离，不相应、极解脱，不以离颠倒之心而多处之。诸比丘！我不知所谓的‘现前圆满觉悟无上正等正觉’。

诸比丘！我从何对此等四圣谛生起如此三转十二行相之眼，生起智、明、觉、悟，我从此从此天世间、魔、梵天、沙门、婆罗门之诸众、天人中解脱、出离，不相应、极解脱，以离颠倒之心而多处之。诸比丘！我从此知晓所谓的‘现前圆满觉悟无上正等正觉’”。

颂宣此法门时，具寿憍陈如和八万诸天对诸法生起无尘离垢之法眼。

于是世尊对具寿憍陈如说：

“憍陈如！你是否完全掌握了法？”

“世尊！完全做到了。”

“憍陈如！你是否完全掌握了？是否完全掌握了？”

“善逝！完全做到了。完全做到了。”

具寿憍陈如完全掌握了法，因此具寿憍陈如被冠之以“遍知憍陈如（阿若憍陈如）”的称号。

地上的诸夜叉发出音声：“具寿憍陈如完全掌握了法。”发出乐音：“朋友们！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说鹿野苑处，为利益众生，安乐众生，悲悯世间，为诸天人之利益安乐，以三转十二行相转动了沙门、婆罗门、天、魔、梵天谁也未曾在世间与法随顺转动的与法相应之法轮，天众现前增益，非天完全减损。”

地上诸夜叉的音声被听闻后，从游行于空中的夜叉、四大天王、三十三天众、诸离净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众刹那片刻须臾间传至梵天世界

之间，梵身天众也发出音声：“朋友们！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说鹿野苑处，为利益众生，安乐众生，悲悯世间，为诸天人之利益安乐，以三转十二行相转动了沙门、婆罗门、天、魔、梵天谁也未曾在世间与法随顺转动的与法相应之法轮，天众现前增益，非天完全减损。”

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说鹿野苑处，以三转十二行相转动与法相应之法轮，因此，此法门被冠之以“转法轮”的标题。

法轮经结束。

附录二 《转法轮经》藏译汉

印度语：达磨斫羯罗般婆罗怛修多罗

藏语：转法轮经

恭敬顶礼圣三宝！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堕处鹿野苑。尔时，世尊呼召五比丘说：

“诸比丘！出家者不应住于两边。凡诸贪着于此，耽于安乐者，即非如理，成为下劣。异生凡夫因与不饶益相应，与凡诸不应赞叹之离身体疲惫之苦之不饶益相应。诸比丘！此等为二边之边，不应入彼。世尊现前圆满觉悟后宣说此开眼、生智、寂静、神通、通达、涅槃之中道。

诸比丘！世尊现前圆满觉悟后宣说之开眼、生智、寂静、神通、通达、涅槃之中道为何？中道为八圣道支。此八者为：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诸比丘！此为世尊现前圆满觉悟后宣说之开眼、生智、寂静、神通、通达、涅槃之中道。

复次，诸比丘！有苦圣谛，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略说为五取蕴苦。

复次，诸比丘！有苦集圣谛，即凡诸具有生起、与喜贪相应、现前欢喜彼彼之渴爱，所谓欲爱、对轮回之渴爱（有爱）、对离却轮回之渴爱（无有爱）。

复次，诸比丘！有苦灭圣谛，即凡诸于如此一切渴爱离却贪欲、灭、弃、别别变化、解脱、于解脱无有怯弱。

复次，诸比丘！有趋苦灭道圣谛。此亦有八圣道支，所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此为苦圣谛，于往昔未闻法上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显。复次，诸比丘！应遍知此苦圣谛，于往昔未闻法上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显。

此为苦集圣谛，诸比丘！此为于往昔未闻法上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显。复次，应断除苦集圣谛。诸比丘！此为于往昔未闻法上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显。

此为苦灭圣谛，诸比丘！此为于往昔未闻法上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显。复次，应现证苦灭圣谛。诸比丘！此为于往昔未闻法上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显。

此为趋苦灭道圣谛，诸比丘！此为于往昔未闻法上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显。复次，应修习趋苦灭道圣谛。诸比丘！此为于往昔未闻法上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显。

诸比丘！如此阐释之此四种，是为圣谛，如此三转十二行相所成，是为极为清净智见。

诸比丘！我断除后，离诸天界、魔、梵天、沙门、婆罗门、生主、天人，未有其他无上正等觉。

诸比丘！凡诸此为此四圣谛如此三转十二行相所成之极为清净智见，诸比丘！如此我从诸世间天、魔、梵天、沙门、婆罗门、生主、天人现前圆满觉悟通达无上正等觉。我亦见此智，得往昔无有之解脱，我不受后有而得无余依涅槃。

世尊如是颂宣，五比丘现前欢喜世尊所说。自如此授记之后，具寿憍陈如生离尘无垢之法眼，凡诸稍有集成之法，悉皆为灭法。

世尊转法轮后，诸地天发出赞叹之声：“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堕处鹿野苑，

转动沙门、婆罗门、天、魔、梵天、世上谁也无法转动之此未曾转动之无上法轮。”

尔时，听闻地天之声后，四大天王诸天发出赞叹之声：“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堕处鹿野苑，转动沙门、婆罗门、天、魔、梵天、世上谁也无法转动之此未曾转动之无上法轮。”

听闻四大天王诸天赞叹音声后，三十三天诸天发出赞叹之声：“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堕处鹿野苑，转动沙门、婆罗门、天、魔、梵天、世上谁也无法转动之此未曾转动之无上法轮。”

听闻三十三天诸天赞叹音声后，离诤诸天发出赞叹之声：“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堕处鹿野苑，转动沙门、婆罗门、天、魔、梵天、世上谁也无法转动之此未曾转动之无上法轮。”

听闻离诤诸天赞叹音声后，兜率诸天发出赞叹之声：“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堕处鹿野苑，转动沙门、婆罗门、天、魔、梵天、世上谁也无法转动之此未曾转动之无上法轮。”

听闻兜率诸天赞叹音声后，化乐诸天发出赞叹之声：“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堕处鹿野苑，转动沙门、婆罗门、天、魔、梵天、世上谁也无法转动之此未曾转动之无上法轮。”

听闻化乐诸天赞叹音声后，他化自在诸天发出赞叹之声：“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堕处鹿野苑，转动沙门、婆罗门、天、魔、梵天、世上谁也无法转动之此未曾转动之无上法轮。”

听闻他化自在诸天赞叹音声后，梵身诸天发出赞叹之声：“世尊在波罗奈斯仙人堕处鹿野苑，转动沙门、婆罗门、天、魔、梵天、世上谁也无法转动之此未曾转动之无上法轮。”

尔时，刹那片刻之间，音声遍于梵世之间。十千世界亦于此震动、极为震动、极大震动、惕栗，稀奇、显现、于诸世界如此变现。

于诸世界如此变现，梵天听闻讲法后，诸天返回各自住处。

尔时，世尊亦无问自说：“因为完全掌握了，是憍陈如，由于完全掌握了，是憍陈如。”因此，具寿憍陈如获得了“遍知憍陈如（阿若憍陈如）”的名字。

转法轮经结束。

◆ 萨尔吉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ABSTRACTS

Not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and Related Texts

Saerj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various narratives and related works on the Buddha's first discourse on turning the wheel of the Dharma, this paper surveys cognate descriptions in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s. It especially focuses on two Tibetan texts entitled the *Dharmacakra (pravartana) sūtra* that are preserved in the Kanjur. The essay points out that one work, the **Dharmacakrasūtra*, is not an independent translation, but an extract from the *Samḡhabhedavastu* of Mūlasarvāstivāda Vinaya. Yet another work,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Theravāda Buddhism.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daction, transmi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and related works.

A Glimpse of the Battle between Tang and Tubo in the Middle Kaiyuan Period: Details from the Excavated Epitaphs

Wei Yingchun and Ma Zhenying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of Lanzhou University)

The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four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related to Hexi 河西 in Tang Dynasty, while making references to historical rec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Tibetan literature and other records, it aims to reproduce several details of the battl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in the middle Kaiyuan period. The Battle of Yumen 玉门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was recorded in the “epitaph of Li Li” 李礼墓志, which has not been attested elsewhere. The “epitaph of Yu She” 鱼涉墓志, records the tragic battl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in Qilian City 祁连城, and that the tomb owner Yu She died on the day of victory, which can be supplemented with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contained in epitaphs may be helpful to the futur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as well as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elong 河陇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Epitaph of Zhao Hong'an and Tang Jiuzheng's Southern Expedition ——On the Tang-Tubo Relations during the Reign of Tang Zhongzong

Yuan Enda and Lu 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ang Jiuzheng's 唐九征 southern expedition was a military campaign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ang Zhongzong (r.705-710). The historical records pertaining to these events are relatively brief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leaving gaps in our understanding. But the epitaph of Zhao Hong'an 召弘安 housed at the Tang West Market Museum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is epitaph,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the primary target of Tang Jiuzheng's southern military campaigns was the tribal groups in the Yaozhou 姚州 region,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present-day Yao'an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These expeditions had limited, direct involvement with Tubo. Furthermore, during the southern expedition of Tang Jiuzheng, both the Tang and Tubo made concessions to maintain their relationship, but the Tibetan side made larger concessions than the Tang. This suggests that, despite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ongzong, Tubo was still in a relatively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ir practical interactions.

An Exploration of Reasons of Geshu Han's Recapture of Shibaocheng

Li Xuedo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twenty-ninth year of Emperor Xuanzong's reig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741), Tubo launched an attack on Shibaocheng 石堡城. Recognizing its crucial strategic importance, starting from the fourth year of the Tianbao era (745), the Tang court successively appointed Huangfu Weiming 皇甫惟明, Wang Zhongsi 王忠嗣, and Geshu Han 哥舒翰 to lead military campaigns to manage Shibaocheng. Ultimately, Geshu Han defeated the Tibetan forces and brought Shibaocheng back under Tang control. During Tianbao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here was an increasingly intens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Prime Minister Li Linfu 李林甫 and Crown Prince Li Heng 李亨. Although Huangfu Weiming and Wang Zhongsi were loyal to the Crown Prince and were stationed in the borderlands, they could not stay aloof from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e successive military campaigns launched to recover Shibaocheng were affected by the power struggle at the imperial court, resulting in Tang forces returning without success. Geshu Han, as an outsider of the court politics, due to his background as a minority leader, was able to avoid the detrimental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ower struggle on frontline military operations. Additionally,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cipating general Abusi 阿布思 and Li Linfu shielded this campaign from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rivalries. Furthermore, Geshu Han had a relatively strong military force when he attacked Shibaocheng. The Tang army had already launched an offensive against Momi Cheng in Jiannan which distracted Tibetan forces and provided support for Geshu Han's campaign to retake Shibaocheng. This strategy ultimately led to the successful recovery of Shibaocheng. After the battle, Geshu Han gradually built a defensive system centered around Shibaocheng, thereby strengthening its defenses.

A Study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Zhang Xu and Zheng Hongxiang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a serie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ibet, making him an influential figure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Tang-Tibetan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Zhol* Pillar, Klu khong's rise in government positions was marked by a series of promotions due to his role in reporting and suppressing rebellions. He was initially appointed as *nang blon* and later promoted to the positions of *nang blon chen po* and *yo gal 'chos pa chen po*. But Klu khong faced a challenging path to his advancement, as he did not come from a noble background and adhered to the Bon religion, which created obstacles for his career. Despite the triumph of the capture of Chang'an, Klu khong did not receive further promotions and, in fact, experienced a prolonged period of stagnation in

his official career. Over a decade later, he reemerged in the public eye and assumed the positions of *nang blon* and *yo gal 'chos pa*, holding one of the highest-ranking positions in the Tubo court, second only to the *Blon chen*. This was the highest office he held throughout his career, as he never served as the *Blon chen*.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dhyamaka Tenets in the Treasure Text Titled *Gsang sngags lung gi bang mdzod*

Yang Jie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ng cruc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ly period of treasure tradition, Nyang ral Nyi ma 'od zer and his famous treasure cycle *Bka' brgyad bde gshegs 'dus pa* have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quite a few scholars. Following in the steps of earlier research that has illuminated the origins of some of the tantric texts in this cycle,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dhyamaka tenets within the *Gsang sngags lung gi bang mdzod* — a doxographical work that also belongs to this cycle.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what becomes clear is that this classification has its Indian precedent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dox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Nyang ral's time. In the author's view, this nominally revealed treasure text obviously absorbs the doxographical framework prevalent during the early *phyi dar* period, and is quite important for our further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xography of that period.

Gri gum btsan po and the Bon Treas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An Analysis of Sga ston's (14th C.) *History of Bon Treasure*

Naljor Tsering

(Doctoral Student,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SL, CRCAO)

The treasure text or *gter ma* is a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is mainly popular in the Buddhist Nyingma school and the Bon tradition in Tibet. Bon *gter ma*-s began to emerge in the 11th century, and a special historical narrative regarding their burial, discovery, and transmission already took shape in the 14th century. The origin of a given *gter ma* and the reason for its transmission usually constitute the very first topics to be explained in these narratives. Regarding these topics, Nyingma scholars usually provide the story of Padmasambhava a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of Tibetan Buddhist *gter ma*-s whereas the Bon tradition connects its origin to the two transition periods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Tubo period (also known as the two “extinction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B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irst extinction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n, that is, the story of the eighth king *Gri gum btsan po*, as a case study and explores how the later generations of Bon scholars use legends and stories regarding the period of the Tibetan Empire to construct *gter ma*-origin stories for their own tradition.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story, we can understand how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the Bon *gter ma*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Bon doctrinal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inspiration it received from the Buddhist narrative (on the “extinction of dharma”), while inheriting many unique indigenous elements and cultural contexts.

从娘热·尼玛沃色所掘《八教善逝集》来看早期《四普巴续》及其与远传法及伏藏法统之间的关系

凯西·坎特维尔

(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

娘热·尼玛沃色在十二世纪所掘出的《八教善逝集》(*bka' brgyad bde gshegs 'dus pa*)成为了宁玛派以八密教尊神为核心修行的范本。在此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提出《八教善逝集》中关于“事业普巴”(*'phrin las phur pa*)的部分可能形成于娘氏之前的时代,并保留了古时的修习传统。本文结合远传法(*bka' ma*)文献中属于娘氏传承的教法,进一步对这些与《四普巴》或《四普巴续》(*phur pa'i rgyu bzhi*)相关的普巴文献进行探讨。《四普巴续》教法在这些文献中的中心地位很可能影响了此后的金刚普巴传承,因为它们也强调这些教法的重要性。本文主要探讨远传法和娘氏法中的《四普巴续》教法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早期四普巴教法之间的联系。《堡岩》(*rdzong 'phrang*)中只有《八教善逝集》是很早期的,而四普巴中的一篇简短教言很有可能是源自历史上的莲花生大师。此外,《四普巴续》中引用的同一主题也被收录进了《八教善逝集》中的权威文献。娘氏将《八教善逝集》称为伏藏,使得藏王墀松德赞被重新纳入该传承体系之中。墀松德赞原本并未在此传承序列之内,而是作为《堡岩》的主要授记对象而被新加入的。因为娘热是墀松德赞的转世,《八教善逝集》伏藏中的关键文献据称是来自墀松德赞的写本。

以药为经：医药伏藏中的炼金术与藏地的佛教医学

麦伟哲

(美国纽约大学)

伏藏师在伏藏文献中能够以叙事的方式建构宇宙观层面的教说。如藏地的医师与仪轨师多将服石法 (*bcud len*) 认为是莲花生大师的伏藏法, 是佛陀原初的教法, 或是藏地医学的经典。本文旨在对藏地的医药伏藏进行简要介绍, 尤其是以相传为袞邦达沃 (*Kun spangs zla 'od*, 又名 *Kusasmanpa* 或 *Sku sa zla 'od*) 所传之《因陀罗手服石》(*Dbang po lag pa'i bcud len*)、《阿育吠陀》及《医学四续》等文献中的相关教法为中心来解读, 将这些医药文献构建为佛教经典的叙事框架。总的来讲, 本文提出医药经典不一定总是指向一个真实存在的过去, 而是以叙事来规范其所期许的起源。与此类似, 在佛教医学中, 医学理论与实践指导也成为了诸佛的教诲, 疗愈与菩萨戒相融合, 医药也成为了成佛之道。将药书作为佛典来解读, 便可以将医学实践根植于一个叙事所创造的世界中。本文探究了佛教医药伏藏的叙事世界, 并讨论了其在后弘期 (约 950-1250 年) 兴起的历史背景。

U rgyan pa Rin chen dpal's Speech as a Source of the *Blon po bka' thang*

Sun Penghao

(Doctoral Student, Harvard University)

Inquiries into the textual sources for O rgyan gling pa's influential treasure cycle, the *Bka' thang sde lnga*, have long fascinated scholars. It is now widely accepted that it contains authentic ancient materials. This paper identifies a passage in the twenty-ninth chapter of the *Blon po bka' thang* as being an adaptation of a speech preserved in a fourteenth-century biography of U rgyan pa Rin chen dpal (1230–1309).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lies hidden, as O rgyan gling pa transfers U rgyan pa's diction and metaphors from its original context into the mouth of the legendary eighth-century figure Padmasambhava. Furthermore, the speech was modified from a general defense of the traditions of Rnying ma, *gter ma*, and Zhi byed traditions to a specific defense of the *gter ma*. This identification not only adds a fourteenth-century material to the current pool of the known textual sources of the *Bka' thang sde lnga*, but it also gives us an example of creative textual reuse and the microscopic manner of in which this treasure-revealer compiled his work. Furthermore, the inter-textuality offers us a rare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the readership and reception of U rgyan pa's biography, as well a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polemical rhetoric in general.

The Impact of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s (1597-1652) *Gter ma* lineage on the Religious Pattern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nam rgyal Dynasty of 'Bras mo ljongs

Xu Yuanqin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Three great masters belonging to the Rnying ma school,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 (1597-1652), Mnga' bdag Sems dpa' chen po (1591-1656), and Kaḥ thog Rig 'dzin Chen po (17th C.) empowered Phun tshogs rnam rgyal (1604-?) as he was enthroned in 1642 to become the first religious king (*chos rgyal*), also Rnam rgyal, of 'Bras mo ljongs or 'Bras mo gshongs, that is, Sikkim. This opened the path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nying ma pa gter ma-revelatory tradition, from the central region of Ü-Tsang to the southern region (*lho phyogs*), Sikkim. Lha btsun Nam mkha' 'jigs med w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itial transmissions of this tradition, which he had received from the great *gter ma* master 'Ja 'tshon snying po (1585-1656). Upon his enthronement as religious king, Phun tshogs rnam rgyal supported the propagation of Lha btsun's tradition throughout 'Bras mo ljongs and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onasteries that would be affiliated with it.

In the process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Bras mo ljongs, there was a continuou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religious authority of Ü-Tsang and Lha btsun's tradition. This gradually formed a pattern of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lineages of transmission, sectarian affiliation, and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ain monasteries and branches. The influence of this *gter ma* traditio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early Rnam rgyal dynasty in 'Bras mo ljongs.

Prohibition and Recognition: Dissemination of the *Gter-ma* Literature of the Nying ma School in Mongolia (1607-1738)

Giigch Borjigin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ince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ibetan Buddhism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Mongolia through the spread of the Gelugpa School, which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 undoubtedly has a strong Gelugpa presence,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are mostly written after the Gelugpa school began to dominate Mongolia,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other schools are very rare. Howeve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Gelugpa School was introduced to Mongolia, other schools also spread in Mongolia. In this article, I will survey the literature of the Nyingma School that was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to Mongolian from 1607 to 1738, and explore three

types of non-canonical texts dealing history, ritual and commentary, and thus provide an outline of an enhanced picture of 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in Mongolia.

叙事生活世界：《格萨尔王传·地狱救母》与伏藏的社会功能

娜塔莎·麦克斯

（美国德州州立大学）

本文以《格萨尔王传·地狱救母》篇为例，探讨伏藏在创建一个“叙事生活世界”（这一理论是本文作者专门在此提出并使用的）中起到的社会功能。正如霍莉·盖利（Holly Gayley）、戴维·杰玛诺（David Germano）及其他人所指出，伏藏并非单独存在的现象，而是由复杂的社交互动连接过去与未来而形成的、具有丰富意义的网络。伏藏师通常被认为是文化英雄：他们以过去的意义来涵盖当下的时代，并通过他们与过去的联系建构出一个充满意义的符号宇宙。格萨尔史诗传统尽管在藏地解读中很少被认为是伏藏，但是其传承与伏藏传承多有相似之处，其中最显著的即是经启示而被发现并创制出的新文献范式，这一范式有着超越原初讲述的社会影响。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只有一份格萨尔文本自我认同为伏藏，即由丹喇嘛·却吉旺秋（'Dan bla ma Chos kyi dbang phyug）所著、格萨尔伏藏师扎册多吉（Drag rtsal rdo rje）掘出的《地狱救母》篇。通过对比阅读这一格萨尔传承与伏藏传承所重叠之处，学者们可以通过格萨尔传承来更清晰地解读伏藏的社会功用。在介绍这一重要文本之上，本文更提出通过伏藏基于一个持续有意义并有效的过去而建构出的叙事生活世界，这让个人得以与这一叙事创造出来的过去产生联系，并能在其中构建出自己当下有意义的世界。叙事生活世界因此便成为了伏藏在当代西藏取得社会关切和关联的驱动力。

A Review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Yushu*

Zhu Ming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Yushu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Yushu prefecture and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ichuan University jointly held the "Symposium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Culture Heritage of Yushu" in Chengdu from October 18 to 19, 2021. This symposium received a total of forty papers and nearly one hundred representatives from Beijing, Qinghai, Sichuan, Hebei, Gansu and Shaanxi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There were twenty-seven scholars who delivered presentations during eight sessions, focusing on topics such as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early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rock art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Grottoes, images and texts in Buddhist art", "Transportation and routes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origin region of the Three Rivers", etc. This symposium provided a level platform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greatly promoted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disciplinary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